

南丁格尔的提灯、药箱和玫瑰统计图

高曜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国内一些媒体每天以一幅幅直观而看似炫酷的图表呈现全球疫情形势。这种图表因形似盛放的玫瑰花而被称为“玫瑰统计图”。发明者正是人们熟悉的英国护士弗罗伦斯·南丁格尔 (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她不仅是护理事业的先驱和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也是一名优秀的统计学家。

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南丁格尔带领数名护士志愿者和教会修女前往英国军营,她本人担任野战医院护士长,为士兵提供专业护理,大大降低了伤员感染致死率。她在实践中发现,真正在交火中丧生的士兵并不多,战地医院卫生条件恶劣,战士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战场外感染疾病或受伤后没有得到适当护理而伤重致命。因此,她试图用统计数据来表达战地医院的死亡率,希望政府能够重视战地医院卫生条件。

玫瑰统计图是一种360度的直方图,适用于呈现多组数据对比,它和常见饼图的区别在于:饼图通过扇形的角度大小来表示不同占比,玫瑰图则通过不同半径来对比数据。南丁格尔用这种图表来表达军队医院季节性死亡率,便于看不懂枯燥统计报表的公务人员快速直观地了解死亡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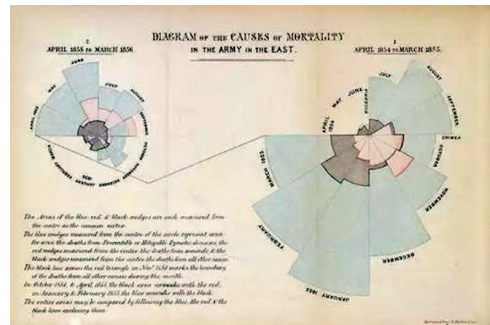
南丁格尔因其在护理专业、统计工作以及循证医疗保健方面的开拓性贡献而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尊敬。她的生日5月12日后被定为“国际护士节”,以其名字命名的“南丁格尔奖”也成为护理事业的最高荣誉。为纪念她的200年诞辰,世界卫生组织将2020年定为“国际护士和助产士年”。

英国南丁格尔博物馆原定于2020年3月8日到2021年3月7日进行为期一年的主题展览,中途因疫情闭馆,但相关展品颇值得拈出一看:

①土耳其提灯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南丁格尔携带这种土耳其提灯在夜间巡回检查病房,她也因此被称为“提灯女士 (The Lady with the Lamp)”。在艺术家创作的南丁格尔画像或雕塑中,常常表现她“举”着希腊灯或精灵灯,这是一种基于想象的创作。

②药箱 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使用过的药箱,包含治疗疟疾的奎宁等药物,还包含一组迷你秤和量具,以及一个配制溶液的玻璃烧杯。

③南丁格尔的医护制服 南丁格尔在军事医院穿着的护士制服,包括一件灰色连衣裙、白色围裙和一条绣有红色“Scutari Hospital”字样的白色腰带。这是现存已知的第一个护理制服的模板,统一的护理制服确保患者和医生认可并尊重护理人员的专业性。



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发明了玫瑰统计图

④《护理札记》

南丁格尔编写的浅显易懂的护理学畅销书,包含很多实用技巧,比如如何正确洗手,如何准备食物,如何对待患者,等等。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奠定了西方护理学的坚实基础。

⑤狄更斯《雾都孤儿》

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狄更斯是南丁格尔的好友,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狄更斯资助了军事医院购买新的洗衣设备的费用。南丁格尔藏有一本狄更斯的小小说《雾都孤儿》。

⑥被拒绝的求婚者肖像

南丁格尔一生中多次被求婚。她几乎接受了政治家和诗人理查德·蒙克顿·米尔恩斯 (Richard Monckton Milnes) 的求婚,但最终在1849年拒绝了他。她认为婚姻会阻止她按照上帝的指引行事。而当哈里·弗尼 (Harry Verney) 爵士向她求婚时,她再次拒绝,并将他介绍给了姐姐并促成二人在次年结婚。她后来还收到了马尔马杜克·威维尔 (Marmaduke Wyville) 和亨利·尼科尔森 (Henry Nicholson) 的求婚,但最终选择了献身于事业和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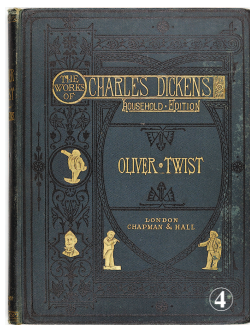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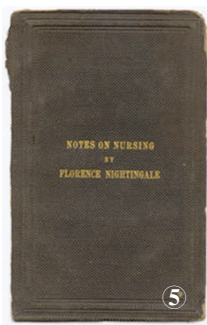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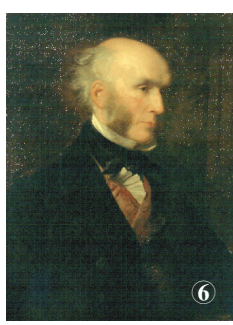
③



④



⑤



⑥

◀ (上接2版)

女性就会被怀疑行巫术。直到17世纪中叶之前,男人完全被排除在分娩之外,正规医生对妇科的关注并不多,产房是女性活动的场域,女性帮助女性生产,这一传统历时千年之久。助产士查看宫颈的扩张程度以及胎儿的位置,然后用油脂润滑生殖器以利于分娩。婴儿出生后,她们清除婴儿呼吸道的粘液,将婴儿洗净并包裹。她们只有在面对臀位之类难产的情况才会求助于外科医生进行V形切割或解剖胎儿的颅骨,以确保母亲能存活。从17世纪中叶起,男性产科医生开始出现在分娩的场合,特别是在张伯伦的产钳发明之后,男性产科医生最初服务于英国和法国的贵族,但普通民众仍然倾向于求助女性助产士。除助产士外,社区中的其他妇女也会来帮忙。婴儿的分娩对整个社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也是一个紧张的时刻:一方面,这意味着那位即将临盆的妇女将履行生子(女)的职责,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家

庭和社区要应对婴儿或母亲死亡,有时甚至是两者的死亡。在没有抗生素和消毒措施的年代,1/10的妇女会在生产时死亡,1/3的婴儿未满1岁夭折。在婴儿死亡的情况下,助产士容易遭受指控——她们会被指控用巫术杀死婴儿,以将其供给魔鬼(通常与胎盘和脐带一起)。内疚自己无法生出健康婴儿的母亲通常是指控助产士的第一人——尽管有时指控可能来自外界。在新教国家中,非婚生子女遭敌视,导致法官认真研究每例婴儿死亡。他们认为,在非婚生产的情况下,母亲和助产士有可能合谋杀死婴儿。

海因里希·克雷默 (Heinrich Kramer) 1487年撰写的臭名昭著的《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一书使人相信助产士与邪恶法术之间的联系是牢固的。他断言“没有人比助产士更能破坏天主教信仰”。1587年,德国助产士沃尔珀加·豪斯曼宁 (Walpurga Hausmannin) 就以杀婴、巫术的罪名被处以死刑,行刑方法极其残酷。

众所周知,近代早期欧洲,女性治疗者遍及英格兰和整个欧洲大陆的乡村。正如一位医疗史专家所说,在乡下“每隔5英里一定会有一位女性治疗者”。她们使用草药治病,这种治疗措施与有执照医师所采用的疗法没有什么不同。她们也大都相信上帝,认为自己在使用来自上帝赐予的力量为他人治病。传统的女性治疗者通常使用被认为是神奇的配方,将她们采集的草药制成各种药物、药水和软膏,当然这在很多人看来是魔法的配方。她们也采用神奇的方法治病,例如“将疾病从患者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或给患者戴护身符等等——这些护身符专门用作预防疾病的目的。后者是她们经常被指控为“女巫”的主要原因。

即使有时女性治疗者被指控为“女巫”,但百姓普遍相信她们,认为她们是白色巫师。尽管自中世纪起教会就谴责白巫术,但其一直存在,没有人认为白巫术是邪恶的,相反,人们认为这是“防止不幸的盾牌”。其实,宗

教与巫术之间的差别很难区分。这些所谓的白巫师尚未发明出自己的巫术:其规则和仪式很大程度上也是天主教教义的衍生品,因为当时除官方支持的祷告外,尚存许多秘密的半基督教符咒,而这些符咒基本上都套用了基督教的程式。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雷金纳德·斯科特 (Reginald Scot) 曾讽刺地写道:“教宗把富人封作圣徒,却把穷人贬作妖巫。”

因此,尽管没有大学学历,尽管被怀疑施行巫术,但绝大多数妇女仍然希望在分娩时有这些被称为治疗者的女性为她们提供帮助,这不仅是因为她们在这一领域的经验被认为值得信赖,而且因为这些妇女是社区的基本成员,经常与产妇相熟,可以为产妇带来安慰。女性治疗者为乡下人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救助,帮助女性生产,她们是当地的接生婆,发挥了“赤脚医生”的作用,也赢得村民的尊重。她们承担了很多今天的“全科医生 (General Practitioner)”的工作。正如马克·吐温回忆起他在19世

纪中期的童年时代时说:“每个妇女都是医生,她从林子里自己采药,还知道怎么配出一副药,让梆硬的死狗吃了都能冒出活气儿。”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策划:
文汇报理部
执行编辑:
任思蕴 rs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封面图片: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
在英国战地医院进行
护理工作的南丁格尔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汇报

